

watch|上观观察家

民生问题突出表明经济增长总体效益不高

□邹民生

民生问题已成为今年全国两会前老百姓关注的热点。从各地先后召开的两会情况看,与会代表也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热点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情况呢?是中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是老百姓现在的日子难过了?还是另有更深层次矛盾需要解决?而民生问题仅仅是衣食住行吗?在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热门话题后面,又隐藏着哪些更需要关注的毛病呢?非常值得思考。

今天,民生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并不是中国社会遇到了什么大灾大难,老百姓流离失所、穷得叮当。相反,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锐减,老百姓整体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生活成本的快速上升,老百姓生活压力不断加大,加上体制、机制的变革,老百姓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正承受着越来越多的改革代价。因此,民生问题尖锐,实质上

在中国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快速增长时,民生问题居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话题,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益需要反思。如果速度上去了,全社会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却日显突出,那只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益是不高的,全社会在资源配置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经济发展不光只有一个速度指标,更需要有多方面的有机配合,有多个指标加以检测,只有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得到均衡发展,那才是一个有效益的增长。

另有原因,它是中国经济发展遭遇瓶颈的反映,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这种失衡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了民生问题。

首先,区域与产业经济发展失衡对城乡居民的就业产生了全方位影响。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国情所致,国家在东部地区先行探索。东部的崛起,一方面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拉开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使全社会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同时伴生的一、二、三次产业的大调整,也使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它的正面意义是几亿农民离乡离土加入了城市就业大军,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并导致了全社会劳动力配置的失衡。

其次,社会分配的失衡造成了贫富差距加大,加上生活成本

的迅速上升,加剧了老百姓的生活压力。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配至少在两个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一是社会人群中,占社会不到20%的人占有超过80%的财富。现在,绝对贫困人口虽在锐减,但相对贫困人口却有增加的趋势;另外一个比较不为大家关注的是,社会分配向政府部门倾斜比重过大,其次是企业,老百姓垫底。这样一种向强势阶层和领域倾斜的分配趋势,很难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加剧民生矛盾。

此外,体制改革缓慢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匹配导致的制度失衡也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这方面步子很快,但在制度层面的改革却相当缓慢,甚至困难重重。这种制度短腿现象,至少在两个层

面上加剧了民生矛盾。一是市场层面上,一些享有行政资源的垄断企业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取超额利润从而使市场失去公平,加大了老百姓的消费支出;二是政府层面上,由于公共服务产品的缺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增加了老百姓的支出。比如,民间呼声很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就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失问题。

在中国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快速增长时,民生问题居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话题,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益需要反思。中国社会曾有过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追求发展速度的价值取向。然而,如果速度上去了,全社会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问

题却日显突出,那只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益是不高的,全社会在资源配置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经济发展不光只有一个速度指标,更需要有多方面的有机配合,有多个指标加以检测,只有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得到均衡发展,那才是一个有效益的增长。

另外,民生问题如此突出还表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加以治理的时候了。特别是在与民生相关的地方,需要尽快调整利益关系。说到底,现在的民生问题主要是利益格局问题,是继续向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倾斜,还是让老百姓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继续让垄断部门独享超高级行政资源,还是让社会竞争更趋公平;是政府介入经济与民争利,还是政府回归本位,提供公

共服务、做好行政管理。这其中一些看似非民生问题,其实对民生问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除此之外,现在的民生问题如此突出也表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有资源与环境的硬约束外,也面临着来自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系列挑战。从就业到医疗、从教育到社会保障,在中国社会长达30年、至今还在进行着的历史性转型中,老百姓承担着由体制、机制变革所造成的剧烈阵痛,以及社会大变革的主要代价。这是需要在经济发展、国力强大的基础上,通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来偿还的。只有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才谈得上中国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现在的民生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老百姓生计问题,而是一个与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全社会信用格局有关的大问题,是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需要反思并适度调整社会发展航向的大问题。只有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思考,才能看清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voice|上证名记者
韩志国的视角

□诸葛立早

2007年2月27日的沪深股市暴跌,按照新浪网的说法,这一天,将被黑色标记,以最浓厚的绿色为底,载入中国证券史册。这一天,投资者的万亿市值被蒸发殆尽。一位投资者甚至在论坛上留言:“2月27日的抛单足以和1929年的美国华尔街相提并论”。

对2月27日的暴跌,国人颇为注重探究目前尚不为人知的缘由。但第二天的反弹,却使人们的担忧转为欣喜,似乎又是一轮“数完跌停数涨停”了。然而,“黑色星期二”余波却开始在世界蔓延,给全球金融界震惊。中国A股首次“震荡”世界,亚太、美国、拉美、欧洲乃至南非股市都出现了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暴跌,美国三大股指更是创下了“9·11”以来的最大跌幅。美国白宫发言人、日本官房长官、澳大利亚总理也不得不纷纷致函稳定人心。“股市的世界是平的”,中国人真正从现实而不是仅仅在文字上了解了它的深刻内涵。当然,也有一些市场人士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黑色星期二”是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开始”。

对此,我是无论如何也自豪不起来。特别是看了本报前几天发表的韩志国先生撰写的“全球股市‘蝴蝶效应’引出三大教训”的文章,心头更是平添了一种沉重感。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中国股市这个与全球其他市场差异极大的半封闭市场,因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导致八成以上股票跌停,并在全球范围内诱发了“蝴蝶效应”,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投资市场全线大幅下挫。于是,一个硕大的问号跃然纸上:这次由中国股市诱发的全球股市暴跌,会不会演化为一场金融危机?韩志国的答案是肯定的。

不过,韩志国又提出了值得深思的三大教训。一是如果政府对股价指数过度关注会诱使市场行为发生走偏甚至严重走偏;二是没有风险防范体系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市场是最危险的市场;三是开放式基金既可能是牛市形成的助力力量,也可能是市场崩盘的助推力量。他认为,稳定的市场发展需要有稳定的股市制度与稳定的股市政策,和谐的社会要求有和谐的经济与和谐的股市。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没有强大的股市就很难有强大的经济,没有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就很难有整个经济的持续进步。依此之见,韩志国提出的值得深思的三大教训,比探究股市的指数上下、市盈率高低,更为紧要。

倘若要“狗尾续貂”,我以为,似乎还应该加上一条,必须强化对网络媒体的监管。传闻何以能大行其道?它们最快捷的路径就是网络媒体。君不见,所谓的几大利空,诸如证监会要求强力措施清查违规的入市资金、央行在短期内将加息、国税总局将征收资本利得税、国家证券监管部门领导人将调任他职,等等,哪一条见诸传统新闻媒体?在“杯弓蛇影”的恐慌心态之下,这些消息被以讹传讹,又通过网络媒体的互动渠道,进一步放大、扩散,尽管公众对互联网的信任度在逐年下降,但它快捷性与互动性的优势,无疑会迫使人们迅速接受,几乎容不得仔细思考。韩志国说,一只蝴蝶的震动被放大到足以引发海啸这种现代金融学描述的“蝴蝶效应”,在这次股市暴跌中得到了活灵活现的演示。巴菲特名言:“只有到潮水退去,才知道谁是裸泳者”。遗憾的是,当这次传闻被攻破后,人们至今还不能知道谁是“裸泳者”(即传闻来源)。中国证券市场有指定信息披露制度,有证券分析师登记制度,然而,在现在的网站及其博客上,谁都可以发布信息,谁都可以分析、推荐个股。甚至那个“洋炒家”罗杰斯,也可以在中国国家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对中国股民指手画脚,并且以自己持有的股票为例,进行评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对媒体的监管方面,必须做到一体进行。这也是风险防范体系与风险防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一步健全金融法制和强化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这是风险防控体系最近提出的要求。这篇大文章,要从一件件具体的实事做起。

财政超收何必急于投向“稳定基金”

□马红漫

尽管高企的药品价格一直被消费者所诟病,然而作为药品供应的医药企业,事实上也并未从中获利。有媒体报道,日前,上百家药企集体上书国务院,建议改变医疗领域“以药养医”的传统机制。

导致“以药养医”这一体制性顽疾的关键在于财政支出对公共医疗领域投入乏力。据统计显示,在我国公立医院的支出中,政府投入的只占7%,有的三甲医院甚至只有3%,剩下的支出均要靠医院自筹解决。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格局最终导致医院成为逐利的实体。而药品价格加成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医院运营和发展重要来源。

由此,尽管我国对药品价格的治理工作已经推进了10年,全国性大规模降价已逾21次。但是,在声势浩大的药品降价浪潮中,消费者却并未真正享受到实惠,许多药品出现了“降价即死”的怪现象。与此同时,医药企业的经营成本也水涨船高,医生回扣、招投标公关费提成等费用严重蚕食了其最终利润。据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医药工业年纯利润率税前为9.7%;2006年前10个月,其利润率则降为6.34%。

医药生产企业将申诉的矛头指向“以药养医”体制,指向财政投入不足问题具备了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足以表明,协助医

院回归“救死扶伤”本性的根本途径还在于财政支出在医疗领域的合理投入,也就是提高国家财政支出管理的效率与社会效益。事实上,我国财政收入形势持续转好,财政超收的速度非常快。然而面对巨大的财政超收资金,我们却发现其投入方向在偏离民众福祉的保障轨迹。据报道,有关部门可能会成立一个“稳定基金”,进行财政预算的调节。事实上,不仅仅是财政稳定基金,财政增收资金投向“偏大企业、偏宏观”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

财政支出的有效性是政府管理能力的一种体现。当前,在提高我国财政支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过程中,改变财政重收入轻支出的观念十分重要。而这一观念的改变需要加快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步伐。

稳定基金的设立或许可以为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提供一个新工具。但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对于宏观调控的效果,最终还是要通过百姓基本福祉水平的提高中得到显现,在社会保障部门存在严重的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微观个体的福利利益尚无法获得充足的保障,财政资金投向与次序显然应当以此为先导。

在经济整体发展形势向好的情况下,“赚钱不难”或许会成为常态,但是如何“花钱”,也就是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的有效性则需要倚仗于科学、高效的财政支出,财政资金“花钱”也需要技巧。

扩大内需必须加快解决民生问题

□冯玉国

在3月3日举办的中国零售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表示,促进消费是中国今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之一。通过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使中国今年的消费仍然能够维持较高的水平,以进一步增强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和拉动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步由投资、出口拉动转为内需拉动。

众所周知,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我国经济增长残缺了一驾马车。在过去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合计占到GDP总值的大约80%,并且仍在以每年25%到30%的速度增长,而消费则逐渐滑落至历史低点。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有放大趋势。

单就出口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口越来越多,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我国商务部驻美使馆经商参处近日发布文章显示,美国2006年对外贸易数字出炉后,其国内各方正在对布什政府施压,要求对华采取更强硬贸易政策,分析指出,此前美国在WTO对华发起涉及钢铁、木材及信息技术产品的反补贴申诉,还仅仅是一个开始。更有甚者,在美国上月中旬公布了7636亿美元贸易逆差



漫画:刘道伟

数字后,近日参议院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联合提出一份提案,要求撤销给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据媒体报道,就在美国政府宣称就中国采取非法贸易补贴做法,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两天后,日本也表示考虑将加入美国掀起的反补贴行列,就工业补贴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与此同时,欧盟开始频频启动对华反倾销,甚至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不断对我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可以想象,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扩大,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

的贸易摩擦还将加大。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拉动内需,把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步由投资、出口拉动转为内需拉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解决民生问题,使民众从压力中摆脱出来,放心大胆地消费。

我国内需不畅,民生问题是主因。近年来,水、电、天然气等快速上涨,被称为“三座大山”的房价、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也在快速上涨,仅中国高校学费在短短15年间就上涨了25倍之多。而我国居民工资上涨的速度却相对缓慢。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

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房价、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及水、电等资源性价格的上涨,加之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完全建成,居民工资收入低于GDP的增长,导致我国民生问题日益凸出。这些问题加大了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而这正是制约内需的根源。因此,扩大内需与解决民生问题是一种对应的因果关系,要拉动内需,必须使我居民摆脱后顾之忧。

应以监督和考核让大学回归本分

□林江桦

3月3日,一直关注教育公平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痛批极少数名校为代表的中国高校沉疴泛起,严重地遗失教育公平。他说:“很多高校经济霸道、陷入财务危机,而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四大名校硬件设施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可巨大投入没有相应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

近年来,高校的世俗化倾向极为明显,曾经被视为文化净土的高校因对功利的过分追逐而表现出强烈的浮躁与不安,使大学精神的基本元素——自由精神、独立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等等,逐一丧失,导致高校成了浮华与喧嚣的场所。高校成了探囊社会财富的工具,而不是创造知识、科技、文化财富的源泉。目

前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之差距已屡遭社会批评。

倘若听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不仅可能毁了高校,也可能毁灭大量人才。高校的堕落很大程度上与对它的约束与考核的缺位有关系。目前,将资金用于何处基本由高校自己决定,而且,无论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怎样,基本上都是以就业率来评判高校,而高校通过数字上的弄虚作假即可蒙混过关,根本没有提高教育质量的动力。

国外许多大学与我们比起来显得非常寒酸,但是,它们为社会贡献了许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培养了大量的高端人才。我们必须使高校走出功利和浮躁的误区,找回丢失的大学精神。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建立起考核大学教育质量和科研质量的机制,以考核标准决定对大学的投入,同时,对高校的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的规范和监督,对高校大兴土木的行为进行制止,促使高校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教学与科研上,而不是基建上。

代表委员不应被自身利益束缚

□吕青

房价是市民和网友最关注的民生问题。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九部委《意见》处罚开发商囤房、炒房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这些对开发商的种种限制与处罚于法无据或侵犯其合法权益,他建议国家机关不要仓促出台“急就章”式的政策。

九部委出台的十五条细则规定:“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恶意炒作、哄抬房价的房地产企业,要加大整治查处力度,情节恶劣、性质严重的,依法依规给予经济处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并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所说的“处罚于法无据或侵犯其合法权益”,指的就是这一条。

九部委出台的这一细则影响重大,不可能不经过法律专家把关就匆匆出台。作为法学

硕士,对此或有发言权,九部委打击、惩处“捂盘惜售、囤积房源,恶意炒作、哄抬房价”行为,有着极为明确的法律依据: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

第二,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2006年国务院令461号)第五条规定:“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或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国家发改委《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4年第14号令)第二条规定: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四)囤积居奇,导致商品供不应求而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的。”

其实,在全世界任何法治国家,囤积居奇行为都必然是被打击的对象,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彭磷基先生具有两个身份,一是全国政协委员,二是祈福集团董事长——祈福集团是“2006年广东房地产综合实力10强企业”。彭磷基先生在对有着明确法律依据的九部委十五条细则发出质疑的时候,或许是自己作为企业领导者的角色占了上风。

无论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来自于各个行业,要讨

论的是国家大事,其着眼点也应该放在更高的角度,不能被自身利益所局限。对于政协委员的职责,在新修订的政协章程中做了明确规定,即政协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项主要职能是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参与国家事务、发挥重要作用的内容和基本形式。对于人大代表,我国代表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应该认识到,代表、委员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每一个名额后面都有全国人民的期许,代表委员应该走出自己利益局限,站在国计民生的角度,推动最迫切问题的解决。